

毛泽东曾为夏明翰烈士做媒

1928年3月,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活动家夏明翰在汉口被国民党反动派残暴杀害,年仅28岁。夏明翰牺牲后,他的妻子郑家钧“坚持革命继吾志,誓将真理传人寰”,在风雨如磐的年代始终坚守革命信念,并把他们唯一的女儿夏芸抚养成人。

接受采访时,86岁的夏老因患病卧床已有三个年头。夏老把手挪出被窝,指了指桌子上正正当当摆放着的一面相框。相框里嵌着一张带有题词的照片,照片上是年轻的夏明翰,照片右侧是那首气壮山河的《就义诗》:“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夏芸回忆,这是谢觉哉同志1960年到长沙看

望母亲郑家钧时当场题写的,表达了他对亲密战友的怀念。

夏明翰1928年就义时,夏芸还不到半岁,“可以说,他们是在革命工作中相识相爱,是真正的革命伴侣。”

夏明翰在长沙工作期间,曾领导人力车工人罢工。当时,身为湘绣女工的郑家钧在掩护领导罢工斗争的夏明翰时,右臂中弹受伤。后来,夏明翰经常来看望她,为她的勇敢和坚强所感动,两人互生爱慕。

1924年4月的一天,毛泽东来到夏明翰房间,见他在洗衣服,颇有感触地说:“明翰,该找个伴侣啦!郑家钧对你不是很好吗?”夏明翰回答:“家钧好!家钧好!”

毛泽东高兴地说:“你们俩有共同的理想和情操,情投意合,道同志合,早点成家吧!”

“经过毛主席做媒,父亲和母亲在1926年农历九月初四结了婚。听母亲说,当时来贺喜的人中有李维汉、何叔衡、谢觉哉。他们还专门送了一副‘世间惟有家钧好,天下谁比明翰强’的对联,母亲一直小心珍藏,可惜在抗战中屡次搬家遗失了。”

然而,这对珠联璧合的革命夫妻的浪漫爱情,在1928年夏明翰惨遭杀害后成为绝唱。在夏明翰短暂的一生中,妻子郑家钧给了他最大的支持。在白色恐怖的日子里,她为夏明翰及其他革命同志望风放哨,传送书信,一直



夏明翰夫妇

坚定地掩护夏明翰出生入死地斗争。夏明翰牺牲后,她一方面坚持从事革命活动,同时含辛茹苦地把女儿抚育成人。

据人民网

中央苏区也曾反假币

中央苏区的反假币斗争,始于1932年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铸行金属币。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苏维埃政府旗帜鲜明、态度坚决地对伪造苏维埃统一货币即国币的反革命行径,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1932年春,国家银行所属中央造币厂铸造出限于苏区流通的两角银币不久,市面上就出现了相应的伪币。中央造币厂负责人在第一时间将这个情况报告了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时任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泽东“知道这件事后,十分关心这个问题”,旋即要中央造币厂厂长和业务处长去汇报。

1933年7月,中央人民委员会发布题为《发起拥护国币的群众运动,严厉镇压反革命破坏金融》的第13号训令。训令指出苏区部分地方发生不信用国币或折低其价的现象的原因,“革命战争的猛烈发展,动摇了帝国主义国民党的整个反动统治,使他们不得不采取对苏区的绝望的进攻以及经济封锁的政策,更假造银毫混进苏区,来破坏苏维埃货币的信用……”,进而提出了进一步解决上述问题的要求和措施。

如此严查,取得了相当大的战绩。1933年初,寻乌县吉潭区苏维埃政府在南通梅县北通瑞金大路的必经之地——滋溪乡竹子炭村,拦下从广东挑来的两担食盐。检查后发现其中藏有约5000枚貌似苏维埃两角银毫的毫子,当即扣下,并送中央财政部鉴别。结果证实,这些毫子都是假币。同年8月,瑞金县黄安区禾安乡的地主赖以辉,假装去广东买货,“实际是去偷运国民党军阀伪造来破坏我们苏维埃经济的假毫子170元,企图运进我们苏区来使用”。这一罪行又被寻乌吉潭关税处查出,并将人赃解至瑞京(金)政治保卫局。1934年春,福建省明光县政治保卫分局和福建省政治保卫局,先后破获明光县林坊区不法分子反动团总阙渭川伪造一元的苏维埃纸币案,也得益于严查这一关。

据《世纪风采》

周恩来借查家庭账过问盐价

周恩来夫妇的清廉是人所共知的。与众不同的,他俩都不管理自己的“家财”,也从不沾一分钱钞票。

据周恩来生前身边工作人员介绍,周恩来家庭的收支是这样的:每月去会计处领取他们夫妇俩工资和保管他们家现金与存款的人是周恩来的座车司机杨金铭。用钱多为周恩来的卫士长成元功、贴身卫士高振普。需要用钱时由用钱人从杨金铭那里拿钱去用,用了后无论有无票据,都要到杨金铭那里报账。报账时,一般都要经手人、证明人和收货人三方签名,至少是两人签名。这并非周恩来夫妇的规定,而是西花厅工作人员为了管好周恩来这个“家”自觉养成的习惯。

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一天,从不问自己家庭收支情况的周恩来突然要杨金铭到他那里细报一下他家近两个月的收支情况。杨金铭一时很紧张:难道什么地方出差错了?他随即拿上那本笔记本,还招呼上平常用钱的成元功、高振普等一起赶到周恩来那里。

周恩来见他们都到了,便起身走出办公室,在他的后客厅兼餐厅的会客室长椅上坐下,并示意杨金铭报他家的家庭开支账。

杨金铭拿着记账的笔记本念道:3月1日买大葱5分钱,厨房用;3月2日买盐一斤,1毛5分钱,厨房用。

“停。”周恩来一声叫停后,用疑惑的眼光望着杨金铭说,“你们买盐多花了我一分钱。”

杨金铭一阵紧张,连忙放下笔记本,很快找出了买盐的那张原始收据,上边清楚地写着:“大盐一斤,壹角伍分”。

周恩来查看了那张买盐的发票后,示意他们退去,然后向北京市有关部门打了电话,询问民用食盐为什么每斤要涨一分钱价。当弄清是因为北京市卫生局为了预防市民患大脖子病而对食用盐加碘,才促使食用盐价格提高之后,周恩来这才放心。

第二天,周恩来在外出时对杨金铭和高振普说:“我不是在意多开支的那分把钱,而是因为食盐是千家万户都要使用的消费品,不能随意涨价。”直到这时,他们才知道,周恩来是借查问他的家庭开支来掌握了解社会上的情况。

据《湘潮》

朱德亲自筹划攻下坚城石家庄

石家庄,是联结平汉、正太、石德三条铁路的枢纽,是华北的战略要地。石家庄的防务,在日军侵占时就比较强,蒋介石派重兵进驻后又不断加固。虽然没有城墙,但深沟层层,暗堡林立,也算得上是“地下城墙”了。国民党自诩石家庄是地下有城,共军一无飞机,二无坦克,国军凭着工事可以坐打3年!”

石家庄设防的坚固,引起了

朱德的高度重视。而且强行攻克国民党军队坚固设防的大城市,在解放军历史上还是第一次。10月30日朱德在安国县召开的晋察冀野司炮兵、工兵会议上,朱德和其他人员讨论和研究了如何攻打堡垒,如何进行坑道作业,通过外壕等问题,他还亲自审讯俘虏,连一些营级单位的驻地情况都了解了。

在完成了战役准备工作后,

当日各部队渡过滹沱河向石家庄分头开进,4日前全部到达指定位置。5日夜,晋察冀野战军以隐蔽突击的动作,包围了石家庄各外围据点。

由于准备充分,部署周密,从6日到12日,仅仅用了6天6夜,晋察冀大军就攻克了第一个敌人设防坚固的大城市石家庄,在解放石家庄战役中战果辉煌,歼灭国民党军22677人,缴获汽车280辆,坦克9辆、炮99门、机枪674挺、车头40个、铁甲车车厢数十列。

上将王新亭靠“鉴宝”开始部队政治生涯

开国上将王新亭,从12岁开始曾在当铺当了十年的学徒工,这让他对古玩、书画、金银首饰有了一定的鉴别能力。

1930年春,王新亭找到了中国工农红军鄂豫皖第一军第一师,被分配到一师三团一营一连当战士。红三团团长是倪志亮,政委是江竹青。那年冬天,雪花纷飞,可是,红军战士还穿着单衣。据情报显示,新洲城内空虚,只有一些民团。于是,师长徐向前决定让红三团打新洲,搞点物资回来过好过冬。于是,红三团一口气跑了50多公里,到了新洲城下。没想到,敌人大意过了头,下雪天把城门岗哨都撤了。红三团没放一枪

一弹,就进了新洲城。城内,国民党军的郭汝栋的混成旅也刚刚进城,吃罢晚饭,正在安顿睡觉,并不知道红三团已到了他们跟前。

团长倪志亮一声令下,枪声随即响起。红三团便干脆利落地把郭汝栋的混成旅全歼了,俘虏了一两千人,缴获了大批的枪支和军需物资。

新洲城是个大商埠,城内大的店铺不少。红军战士缴获了许多金银首饰,但战士们不识货的多,把金镯子当铜器要,弄坏了就随地丢弃。此事被倪志亮知道后,立即让王新亭前往辨认。王新亭这个当铺学徒没有白当。在王新亭的鉴别下,鉴定出了许多被弄

坏了的真金首饰。倪志亮说:“王新亭既然能‘鉴宝’,自然有文化,让他当连队指导员吧!”

从此,王新亭开始了部队政治工作生涯。1931年1月,红一师三团改称红十师三十团。王新亭当红三十团政治处主任。1933年5月,王新亭从红三十团调到红十二师当政治部主任;两个月后,即7月,红十二师扩编为红九军,王新亭跟着“水涨船高”,被任命为红九军政治部主任。1935年8月,王新亭从红九军政治部主任位置上调到红军大学政治部主任位置上。1936年9月,王新亭调任红三十一军政治部主任。

据人民网

● 党史上的今天

1941年6月23日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的决定》。6月22日,德国法西斯向苏联发动侵略战争。《决定》指出,在德国法西斯进攻苏联的情况下,“目前共产党人在全世界的任务是动员全国人民组织国际统一战线,为着反对法西斯而斗争,为着保卫苏联、保卫中国、保卫一切民族的自由和独立而斗争”。

1946年6月23日

上海群众5万人举行集会,欢送各界人民团体代表团去南京进行和平请愿。以马叙伦为首的代表团抵达南京下关车站时,遭到预伏的国民党特务暴徒围攻殴打,造成“下关惨案”。

1972年6月23日

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批林整风汇报会上作《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的真相》的报告,对1932年国民党特务伪造“伍豪启事”的情况作了详细说明。毛泽东明确表示:不允许任何人今后在这个问题上诬陷周恩来。

据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 领袖家风

王震半路车坏 蹬三轮车进中南海

1952年到北京工作后,直到去世前,王震坐过五台车。第一台是吉姆,从1954年一直坐到1970年。中间大小修过四次。司机老于说:“王震常年跑基层,汽车留北京,不费。”六十年代初,王震到中南海开会,半路车坏了,他便拦叫一辆三轮车。中南海的门卫不让三轮进。王震说:“毛主席召集的会,已经迟到了。”待王震解释清楚了,门卫战士才让这位共和国的部长搭乘的三轮车蹬进了中南海。

第一台吉姆实在不能跑了,又换一台旧吉姆。当了国务院副总理后,给他配了台吉斯,后来换成了“红旗”。改革开放后,变成了“尼桑”。王震几次对司机老于说:“我们不能总想着换车,能跑就行。我死了,你就用这个车把我送到八宝山。”

到外地视察,王震不坐卧车,总与陪同人员和身边工作人员一起坐十多座的中型面包。这样一可以省汽油,二来在车上随时可以和陪同人员交谈,了解情况。一次在湖南邵阳,他开始不知道前面有警车,后发现警车又是“噢噢”直叫,还粗暴地赶开群众。他非常生气,让车马上停下,但一时又无法制止警车,他便让司机甩开警车,掉转头头选另外的路线走。因工作必须有警车开道时,他也常交待不要动不动就鸣笛,“不要搞得地动山摇”。

据中国共产党新闻网